

成晓军 著

# 曾国藩 的 幕僚们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曾 国 藩  
幕 僚 们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00125057

成晓军 著

K827  
277



# 曾国藩 的 幕僚们



东方出版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的幕僚们/成晓军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0 10

ISBN 7-80627-588-6

I 曾… II 成… III. 历史人物 - 生平事迹 - 中  
国 - 清后期 IV.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0143 号

### 曾国藩的幕僚们

---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望新印刷厂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字数: 340 千

印张: 14.5 插页: 2

印数: 4,000

版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588-6/K·76

定价: 23.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中国的幕府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在当时,一些王公贵族或豪富之家蓄养着大批有才学的食客。如“毛遂自荐”的主人公毛遂就是平原君的食客。到了汉代,军队将帅和文职官员大量罗致文人谋士以辅佐自己的事业,标志着中国幕府制度开始形成。宋代,由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科举取仕制的定型,幕府制度也就衰落下去了。明末清初,幕府制度一度复兴,但就其性质而言,指的是由地方政府主要官员从中下层士人中聘请有才能的人入府署担任参谋、秘书等行政助手的一种用人制度。受聘入幕的人称之为“幕宾”、“幕僚”、“幕友”、“馆宾”、“西客”或统称为“师爷”。幕僚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幕主处理地方民政事务,而与军事很少发生关系。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幕府制度演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其职能不再限于对地方民政事务的处置,而是逐渐扩展对军政、外交、科技以及思想文化一切事务的解决。从而,幕府实际上行使着地方政府的职能,幕僚所起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在这方面,曾国藩的幕府最具典型意义。

的确,曾国藩幕府不仅在近代中国是空前的,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据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记载,著名幕僚达 83 人;但另据统计,曾幕人才实际上超过 400 人以上。在这一庞大的幕僚群体中,尽管各人在幕时间不

尽一致,担任的实际工作多有变动,但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出谋划策者(包括来去自由,不常驻曾幕者)。二是带兵打仗者,三是负责秘书事务者,四是担任后勤供需工作者,五是办理吏治者,六是办理外交、军工等洋务事业者,七是办理文化教育等事务者。由此可见,曾国藩幕府中各色人才都有,堪称为当时中国人才精英汇聚之所。更值得注意的是,出自曾幕的许多幕僚在当时或后来成为各方重要人才。单就政界官员而言,在曾国藩 1872 年 3 月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达 22 人,其中总督 4 人,巡抚 7 人,至于任职道府州县者则更多。曾国藩去世后,增加到总督以上者十余人,巡抚十余人,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知州、知府等不计其数。曾幕盛况之空前,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是无庸置疑的。有人将其称之为“神州第一幕府”,并非虚言。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曾幕如此空前的盛况呢?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人进行过考察,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有人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引发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迫使清中央朝廷不得不将军权、财权和行政人事权下移,为曾幕盛况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环境和条件。有人说,曾国藩的地位和权力超出他人,在士林中声誉和地位的特别,则是其幕府人才济济的主观原因。这些分析确有一定道理,但并未点明问题的关键所在。窃以为,形成曾幕空前兴盛的重要因素,还在于曾国藩本人对幕僚的知人善用,对幕僚的培植和造就。换言之,是曾国藩的独特而又有实效的人才理论和实践起了主导作用。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处在同一时代环境条件下的诸多“中兴名臣”、封疆大吏,他们的幕府状况为何比曾幕稍逊一筹。

早在京城做官时,曾国藩就对人才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人才多寡好坏,关系到国家兴替盛衰,“国家之强,以得

人为强”；“君子愈让，小人愈妄”。他认为，人才兴旺可以转移社会风气，“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而其风气正与否，则“推于一己之身与心”，从自己做起渐及他人，最终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他认为，人才好坏兴衰是从政治军的重要基础。不仅人才与行政的关系非常密切，“用人、行政，两者自古皆相提并论”；而且，人才与治军的关系密不可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曾国藩在从政治军的实践中，逐渐摸索总结，形成了一套识人、育人和用人的方法，为幕府人才群体的兴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曾国藩的识人之道，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看一个人的道德操守。他认为，在实际生活中要求德才兼备的全才是不容易的，但其德不得不讲。应当指出的是，曾国藩所强调的“德”，并非全指程朱理学家宣扬的封建纲常伦理，也不只是停留在“仁、义、礼、智、信”的空泛层面，而是注重虚实结合、体用互补，将道德操守与经世济民联系在一起。他反复提倡“忠义血性”，即是为了增强幕僚的政治素质。他强调“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其中所讲的“朴实廉介”，就是他常常说的“乡气”。因为，乡气重的人“遇事体察，身到、心到、眼到、口到”，具有“劳苦忍辱”的可贵品格。正是由于曾国藩对人的道德操守的严格要求，所以在其众多幕僚中，出现了不少既有德又有才的人才。譬如，罗泽南出身寒微，人生坎坷不平，却能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被曾国藩树为做人的榜样。

二是看一个人的才学能力。尽管曾氏强调人才的道德操守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一个人的才学能力；相反，他对各类人才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于那些能够驾御全局或者独当一面的人才，要求他们做到“勤、恕、廉、明”。他在批牍中指出：“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兼全，可为名



将，可为好官。”对于军事人才，他对之要求更为详尽。堪当将帅者，须符合“知人善任”、“善觇敌情”、“临阵胆识”、“营务整齐”四个条件；堪当营官者，也必须具备“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名利”、“耐受辛苦”四种素质。应当指出的是，曾国藩虽对一个人的才能要求很高，但在实践中从不求全责备，凡有一技之长的，都乐于使用。而对那些无德又无才的人，则坚决摒弃不用。有关曾氏识别一个人的才学大小、德才多寡方面的例子较多。他认为，左宗棠虽恃才傲物，为盛德所累，但终究是个驾御全局或能独当一面之才。从而，在左氏危难之际聘为幕僚，且很快让其独当一面。章寿麟虽救过曾国藩的命，但曾国藩深知其人才平庸，故始终未予重用。据方宗诚记述，曾经有个浙江人因上书受到曾国藩的好评，委任为营官，但不久发现此人既无德又无才，立即予以革退。

三是看一个人的相貌、语言、文字和志趣。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气质可以通过观察其举止言行得出判断，然后才能针对性地予以任用。关于这个问题，有人将其神化到迷信的程度，乃至有一个出版社在无足够证据的情况下重印了一部叫做《冰鉴》的相书，作者署名为曾国藩。对此，我曾在《文史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冰鉴〉的作者系曾国藩吗》的小文予以质疑。我的理由是，遍查《曾国藩全集》中的日记、批文及书信等文字，尽管不时有对某某人相貌、言行的眉批，但无一处提到《冰鉴》的写作，所以我的结论是：曾国藩可能阅读过《冰鉴》之类的相书，但不能断定此书作者就是曾国藩。当然，我们应当承认，曾国藩对一个人的相貌举止的了解而推断其人的学识才能、人品爱好的好坏、多寡，的确有其高明之处。如果将此视为曾国藩善于看相算命的一个依据，那就不符合实际了。实际上，曾国藩是对一个人的相貌、举止等结合起来加以认识的。况且，一个人一时的一言一行并不能代表其自身的整体素质，而是存在着一个不断发



展变化的过程,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此,曾国藩在方宗诚于1864年问及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宜、彭玉麟、杨岳斌、鲍超等人何以能成就功名的原因时作了回答:我只不过在实践中能够看到这些人“忠勇勤朴”才各有选择地予以重用罢了。有人说我能够先知先觉,这是不可信的。应当说,曾国藩在这里是实话实说。

尽管曾国藩渴望能够得到德才兼备的全才,但他明确认识到“天下无现成之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在天下众生之中,“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导之东向东,导之西向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从而,他非常讲究培养人才的方法。这种方法概括说来,则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转移风气,用以陶冶人才。而其转移风气的途径,在于家庭、师友及士林群体。就家庭环境对人才成长的作用而言,“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为此,他以身作则,对子弟们不厌其烦地加以劝导教诲,留下厚厚两大册计120余万言的家训,不仅在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影响到他众多的幕僚。在这方面,彭玉麟受其影响最为突出。据《清代四名人家书》记载说,彭氏一整套“齐家”理论与“修身”主旨紧密结合而付诸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曾氏家庭教育观对其影响至深。他不仅大段引用曾国藩的话语来教训子弟行正学好,而且将其落实到治家的具体行动之中。其弟分离20年后相见,染上吸食鸦片烟之习,彭氏限其戒绝再见;其子为独苗,花花公子习气颇重,调至军营后仍不思悔改,最终被斩首。所有这些,均是对曾国藩说的“治家贵严,严则出孝子”的认同。就师友对人才的指导帮助而言,曾国藩认为“古之君子其载道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帅而掖之,而后者有所阶而进。”他本人既是军政统帅,又是业师;幕僚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受业的生徒。他在给主

持江南制造局的幕僚丁日昌的书信中指出：局中各员譬如弟子一般，阁下及藩师者譬如私塾老师，希望能对他们“勸之以学，教之以身，诚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就士林群体对人才的影响而言，曾氏认为“人才随士风为转移”。如他在就任直隶总督之后，为了使吏治得到厘正，特撰《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勉励学人士子为转移社会风气作贡献。他特别提醒人们，社会风气无常定之格，紧“随人事而变迁”。所以，先行者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要。为了促成这种风气的迅速转变，他专折奏调钱鼎铭、陈鼎、游智开、吴汝纶、薛福成、方宗诚、李兴锐、赵烈文、金如澜、陈兰彬等幕僚到直隶，或“藉其廉勤爱士之风，与此间诸良吏互相砥砺”；或“以其劬劳之素，稍变此间逸惰之习”。事实上，无论是在两湖和江西，还是在江浙和安徽，他曾利用创设书院、刊刻先哲书籍等形式，为转移社会风气做过许多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既造就了幕僚的才学，又使当地风气逐渐得到改变。

二是对人才施以殷勤教诲。曾国藩深感无现成人才可用，所以他对幕僚的教育培养非常重视。对于身边的幕僚，他通过谈心、定期考核等多种方式加以调教，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以写信、批牍或定期接见的方法，加以开导启迪，正如薛福成所言：“有师弟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每逢“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则驰书告诫”。在曾幕中，因曾国藩殷勤教诲而成才的人很多，李鸿章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针对李鸿章初入幕时傲慢习气颇重的情况，曾氏在耐心开导的同时予以严格要求。曾国藩长期养成了早起吃早饭的习惯，爱睡懒觉的李鸿章很不适应，加之恃才傲物，根本不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为了治一治李鸿章的这一毛病，曾国藩每天吃早饭时总要等到李氏来后才开饭，连续多日李鸿章的毛病依然如故。在一次早餐中，曾

氏对又是迟到的李鸿章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毕，拂袖而去。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老师竟为这点小事而大动肝火。从此反省自己的言行，逐渐改正了以前的毛病，不仅懒惰之习没有了，而且在为人处世方面多了几分谦和，最终成为一位权倾一时的显赫人物。

三是宏奖以育人才。曾国藩认识到，高明的人自尊心强，耻居人后，勉之以忠可以为忠，勉之以廉可以为廉。卑琐的人，本无大志，斤斤计较，管得太严则有所畏惧，管得太松则懒散堕落。从而，他将“宏奖人才诱人日进”视为人生的一乐事。这就是说，他很重视对人才的鼓励、表扬，以此培养其上进心、积极奋发的精神，很少对人一味加以苛责、批评，防止其人丧失信心而感到自卑无能。在曾幕400余人中，绝大多数都受到过曾国藩的荐奖，有的甚至一奖再奖，不数年间连升几级者大有人在。尤须指出的是，曾国藩宏奖举荐幕僚，不分远近亲疏、出身高低，只要有才能就一定加以奖荐。譬如著名幕僚彭玉麟、杨岳斌等人，原本出身低微，后来之所以成为“中兴名臣”，便与曾氏对他们的表扬、激励和荐举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是对人才严格要求，有过必罚，不论亲疏。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从而，他对于那些违反营规或不能履行军令状的人，从不心慈手软，严格按照军法处置。幕僚李元度被参劾去职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李元度很有才学，且救过曾国藩的命，但他身上存在着文人好大言的毛病。1860年10月，曾国藩命他率兵防守安徽徽州。在他临行前，曾国藩与其约法五章，其中第一条就是戒浮。但李元度把曾国藩的告诫不当做一回事，未作切实准备即轻易进兵，结果全军覆灭，本人则逗留他处不立即回营禀报一切。曾国藩于是撕开情面，甚至与李鸿章为此事闹得师徒反目也在所不惜，直至把李元度严参革职为止。应当指出的是，并非曾国藩不讲朋友情意，

而是考虑到李元度人才难得,缺点错误不责其改正,既对李本人无益处,也对幕府人才的造就不利。事后证明,李元度能够理解曾国藩对他的一片良苦用心;曾李二人亲密关系如故,且结成亲家之好。

相对于识人、育人而言,曾国藩对于任用人才的方法更为讲究。其具体内容包括“取之欲其广”和“用之欲其慎”这两个方面。简言之,可以将其概括成“广收慎用”四个字。“广收”就是不拘身份,“官绅并重”,尊卑并用;不分区域,多方收罗,“江楚并用”;不分才能大小,虽一艺一技,罔不甄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平时很注重对人才的访察、荐举、督责,经常“料理官车,摘由备查”,“圈点京报”,以获得广泛的人才信息,然后择其“朴实廉介”者收罗之。从幕僚入幕的经过可见,曾国藩延揽人才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他过去在湘、在京时学友,如罗泽南、陈士杰、吴敏树、刘蓉、郭嵩焘等;有的是由朋友推荐而来的,如方宗诚、唐训方等;有的是因诗文受知于曾国藩,如张裕钊、何栻、黎庶昌、钱泰吉、李士棻等;有的因上书献计献策而招聘入幕,如李元度、薛福成、丁日昌、汪士铎、李鹤章、屈蟠等;有的由他人之幕转入,如左宗棠、郭崑焘、吴坤修、莫友芝、李鸿裔等;有的师事曾国藩,早年就被发现为人才,如李鸿章、邓辅纶、吴汝纶、洪汝奎等;有的则是在直接对话,从言谈举止中招聘而来,如容闳、向师棣、罗萱、汪宗沂等;有的因军政才识受知于曾国藩,如彭玉麟、杨岳斌等;更多的人则是在各地访闻而知有一技之长学识出众者,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成蓉镜、倪文蔚、戴望、刘翰清、方骏谟等。尽管这些人在出身、功名、才能等方面不尽一致,但作为一个幕僚群体,则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明显地反映出曾国藩广收人才的本意所在。从这些人的籍贯分布情况来看,除了湖南、江苏、浙江、安徽几个重点省区以外,还有江西、湖北、广东、贵州、广西、四川、福建、直隶等省区。这也反映出曾

国藩广收人才的用意十分突出。相对于传统的重出身、门第和资历的封建用人政策而言,曾国藩的这一广收博纳的用人方法,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它为幕府人才的形成,为幕僚才华的施展,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慎用”,按照曾国藩自己的解释,一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二是量才录用。应当首先指出的是,他所说的“慎用”,主要是针对“广收”而言的。“慎用”与“广收”紧密联系,成为曾国藩用人方法的两个侧面。关于用其所长,尽其所长的问題,他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室穴,牝牛捕鼠、良马守门作比喻,批评用人不当的错误,强调“器使而适宜”对于任用人才的重要性。他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尽力将其付诸实践。大量事实说明,曾国藩对于何处何人都能接纳,从不怠慢轻侮他人,无论是一技一艺或是出身低微的人,他都能虚心接纳,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安置,发挥其所长。关于量才录用的问题,曾国藩认为即是应做到知人善用、因量器使。他在实践中感到,一个人如果使用得当,“当其时,当其事”,那么即使是一个平常的人也能起到“神奇之效”;相反,如果使用不当,那么就会导致人才浪费,即使十分优秀的人才也将“铢铢而终无成”。在多年的从政治军实践中,曾国藩始终坚持这一慎用人才的基本原则。即使是与他有生死之交或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人,也不是无原则、无标准地予以保举、提拔或重用;对于那些犯了错误、违反军令的人,不管是谁,也从不姑息迁就,而是秉公从处,该降级的降级,该查办的查办。当然,曾国藩明确认识到,有才能的人并非无缺点,人才是经过陶冶、磨炼而成的,那种“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人才是不多见的。所以,他用人不拘一格,处事不求全责备,而是根据一个人的才能高低、大小,适当地予以安排。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根据幕府中不同人才的特长恰如其分地使用。他深知左宗棠、李鸿章等有统率全局之才,便向朝廷荐举其担任封疆大吏;他深知彭

玉麟、杨岳斌等足智多谋，能够独当一面，就奏举其担任水军统领；他深知丁日昌、容闳等熟知洋情，就让他们处于中外交涉的前沿；他深知李翰章、郭崑焘、李桓等有理财之能，就让他们担负筹集军饷之责；他深知赵烈文、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才思敏捷，就把他们长期留在幕中，既做秘书工作，又磨炼其学业；他深知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刘翰清等了解西洋“长技”，就让他们专事科技工作；他深知汪士铎、张文虎、莫友芝等为饱学之士，就聘请他们主持编书局或书院诸务，做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他深知郭嵩焘、刘蓉等系经世之才，但不懂做官门道，就留在身边出谋划策，或在离幕后继续保持联系，听取有益建议；他深知王闿运等才学高迈，但无意做官，不惯约束，就听其来去自由，保持密切联系；他深知鲍超等有勇少谋，就让他们冲锋陷阵，很少让其参与决策。等等。可以说，曾国藩对于幕僚的任用，就像使用器具一样，真正做到了只要一个人有某种长处，就予以合适安排，极大限度地发挥其才能。要做到这一点，确非易事，但曾国藩做到了，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毋庸置疑，曾国藩幕府空前盛况的形成，是他独特人才思想在实践中发生作用的结果。本书将以几位著名曾氏幕僚生平事功为主线，重点叙述两者之间存在着的紧密关系。

## 内 容 提 要

曾国藩幕府,是 19 世纪中叶在与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相对抗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壮大的,因其人数众多、盛况空前、影响深远而有“神州第一幕府”之称。本书选取与曾国藩关系最为密切的 8 位著名幕僚: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刘蓉、罗泽南、李元度、丁日昌,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认识、“理解”,以评传形式分别展示他们在修身、齐家、从政、治军、学术方面深受曾国藩培育、砥砺的全过程。全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可读性强。书后所附“曾国藩的其他重要幕僚”,在介绍各自生平事功的同时,突出与幕主曾国藩的关系,具有相当高的资料价值。



# 目 录

|          |   |
|----------|---|
| 前言 ..... | 1 |
|----------|---|

## 第一章 “薪尽火传”

|                          |    |
|--------------------------|----|
| ——曾国藩的事业传人李鸿章 .....      | 1  |
| 科举路上的奋进者 .....           | 2  |
| “生于末世运偏消” .....          | 6  |
| 两进曾国藩幕府 .....            | 12 |
| 发迹上海滩 .....              | 18 |
| “愿为吾师毕未竟之业” .....        | 27 |
| 适时应势而督直 .....            | 33 |
| 对曾国藩对外“主和”思想的实践和弘扬 ..... | 38 |
| 对曾国藩洋务“自强新政”的继承和发展 ..... | 43 |

## 第二章 “奇男子”

|                         |    |
|-------------------------|----|
| ——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 .....       | 49 |
| 不平凡的早年经历 .....          | 50 |
| “墨经从戎”助曾国藩练湘军水师 .....   | 56 |
| 田家镇一战使湘军水师名闻天下 .....    | 61 |
| “芒鞋徒步”七百里解曾国藩南昌之危 ..... | 68 |
| “彭郎夺得小姑回” .....         | 74 |

|                      |    |
|----------------------|----|
| 血战九洑洲定合围金陵之势 .....   | 77 |
| 与曾国藩合创《长江水师章程》 ..... | 85 |
| 功成身退以遂初衷 .....       | 91 |
| “修身齐家”以曾国藩为法式 .....  | 97 |

### 第三章 “孤独的先行者”

|                     |     |
|---------------------|-----|
| ——曾国藩的至交好友郭嵩焘 ..... | 107 |
| 早年的科途奋斗 .....       | 108 |
| 为镇压农民起义献计献策 .....   | 114 |
| 与僧格林沁从合作到翻脸 .....   | 121 |
| 从苏松粮道到两淮盐运使 .....   | 131 |
| 粤抚任上的是是非非 .....     | 140 |
| 坎坷不平的出使之行 .....     | 148 |
| 还郭嵩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  | 162 |

### 第四章 “相期无负平生”

|                      |     |
|----------------------|-----|
| ——曾国藩的畏友左宗棠 .....    | 167 |
| “寒素”家世与艰难的科考之途 ..... | 168 |
| “力耕读书”十年功 .....      | 173 |
| 初次出山显奇才 .....        | 179 |
| “湖南一日不可无宗棠” .....    | 184 |
| 从襄办军务到独当一面 .....     | 193 |
| “同心若金”与“攻错若石” .....  | 202 |

### 第五章 “笑谈都与圣贤邻”

|                    |     |
|--------------------|-----|
| ——曾国藩的学术至交刘蓉 ..... | 212 |
| “少负奇才” .....       | 213 |
| “海内论义我最先” .....    | 217 |